

课堂抬头率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李浩然, 朱雅云, 李 研, 王梦程

苏州科技大学教育学院, 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6日

摘 要

课堂抬头率, 是衡量高校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参与度的重要指标, 近年来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选取国内相关研究, 对课堂抬头率影响因素的已有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在研究视角上, 现有研究主要从学生主体因素、教师教学因素、课程与环境因素以及技术媒介因素四个层面展开分析, 已经初步搭建起多维度的解释框架。在研究方法上, 相关研究大多采用问卷调查和经验总结的方式, 理论框架则多借用心理学、传播学和教育学的成熟理论。本文指出现有研究在概念定义与测量标准、研究方法单一性、理论整合不足以及多因素交互作用分析等方面存在的局限。在此基础上, 从测量方法标准化、研究方法多元化、理论模型整合化三个维度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以期为深化高校课堂投入研究、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关键词

课堂抬头率, 影响因素, 高校课堂, 文献综述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lassroom Head-Up Rate

Haoran Li, Yayun Zhu, Yan Li, Mengcheng Wang

School of Education,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Jiangsu

Received: May 7, 2026; accepted: June 25, 2026; published: July 6, 2026

Abstract

Classroom Head-Up Rate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students' classroom engagement, and it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elects relevant domestic studies and systematically reviews existing findings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Classroom Head-Up Rate. From a research perspective, current studies primarily analyze four dimensions: student-related factors, teacher instructional factors, cours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echnological media factors, thereby preliminarily establishing a multidimensional explanatory framework. Methodologically, most studies adopt questionnaires and empirical summaries, while their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ten draw on established theories from psychology,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education. This paper identifies several limitations in existing research, including inconsistencies in conceptual definitions and measurement standards, over-reliance on a single research method,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a lack of analysis on multi-factor interactions. On this basi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standardization of measurement methods,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s.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view will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deepening research on classroom engagement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niversity teaching.

Keywords

Classroom Head-Up Rate, Influencing Factors, University Classes, Literature Review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大学课堂是传授知识、思想碰撞与能力培养的核心场所。近年来，高校课堂中“学生低头、教师单向讲授”的现象逐渐增多并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2017年，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公开指出部分高校课堂存在“形式上在场，精神上缺席”的问题，让“抬头率”这一形象化概念进入大众视野，成为衡量学生课堂参与度的重要指标。

“课堂抬头率”，通常指学生在课堂上主动抬头听讲、跟随教学节奏、参与课堂互动为主要特征的行为参与比例。课堂抬头率直观反映了学生的注意力分配，也隐含着更深层的教育问题：学生在课堂上不只要身体在场，更要思维和情感在场。王宝森等人(2025)设计了标准的问卷考察大学生课堂抬头率与教学成效之间的潜在关联，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提升学生的课堂抬头率是改善教学成效的有效策略。当前，高校课堂面临着大学生认知习惯转变、电子产品普及、在线教育资源方便快捷等多重挑战，找出并分析导致学生低头心理和行为的因素，是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的前提。

本文对国内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整理，旨在回答课堂抬头率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同时梳理该领域现有的共识与分歧，指出该领域研究空白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2. 课堂抬头率的影响因素

综合现有文献，研究者对课堂抬头率影响因素的识别可归纳为四个核心维度：学生主体因素、教师教学因素、课程与环境因素、技术媒介因素。

(一) 学生主体因素

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其自身特征与状态被认为是影响抬头率的重要基础性因素。

学习动机与课程价值认知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影响因素。部分学生在思政课、选修课中表现出学分导向的学习取向，缺乏内在动机。庞睿(2020)在对600名不同专业、年级的学生进行的课堂调研结果显示，有32.8%的学生认为思政课对自己将来找工作没有任何帮助，有26.3%的学生认为，思政课不如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如为各种资格证的考试做准备，或者完成作业等。当学生认为课程内容与考试成绩和找工作

关联较弱时,其学习动机与课堂参与意愿显著降低。

学生的信息获取习惯和自控能力是另一重要因素。当代网络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改变了大部分学生的信息获取习惯,学生越来越依赖并满足于快节奏、娱乐性强的信息情感体验。长期接触这种快餐式、碎片化信息的学生,很难再去适应需要集中注意力的课堂学习。并且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也没有足够的自控能力,许培瑾(2025)对534名不同专业、年级的学生开展的调查结果中,仅有5.43%的学生能全程保持注意力,25.09%的学生很少集中注意力,而33.9%的学生几乎无法集中注意力。

(二) 教师教学因素

教师是课堂的组织者与引导者,多数研究都把教师的教学行为当成影响课堂抬头率的关键变量。顾晓英(2018)提出优秀的师资集成是确保“抬头率”的“软实力”,认为教师永远是影响课堂教学“抬头率”的最重要因素。付晓容(2018)认为课堂感召力是教师的关键能力,是影响学生课堂抬头率的核心因素,具有课堂感召力的教师能够很快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课堂上来。随着多媒体的快速普及,大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已不再局限于书本和教师,教师的课堂感召力也因此面临削弱与挑战。为此,教师应主动参与培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在新时代的课堂中继续保持并强化课堂感召力。教师个人魅力与师生关系也与课堂抬头率息息相关。幽默风趣、富有激情、尊重学生的教师,往往更容易获得学生的情感认同。庞睿(2020)指出,在高人气、受欢迎教师的思政课上,学生的获得感强,认同感强,兴趣点浓厚,能够全身心投入课堂,这类课堂的学生抬头率远高于平均水平。

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至关重要。曹婧喧(2020)面对某校发放的问卷中,1150人里927人认为,同学们不抬头听课的原因是老师讲课内容枯燥,让人厌倦,占比80.61%。照本宣科、内容陈旧的教学难以引起学生兴趣。将理论与现实案例相结合,用贴近学生经验的教学范式与呈现方式传授教学知识,有助于吸引学生注意力,提高课堂抬头率。长时间的讲授式教学容易导致学生厌倦、分神,在课堂上融入提问、讨论、案例分析等互动元素,能够有效维持学生的注意力。许培瑾(2025)的研究中,有很多学生赞同教师在课堂上“引入更多实际案例”“定期组织互动活动”“增加学生主导的讨论环节”。

(三) 课程与环境因素

课程类型是学生对待课堂的关键因素,通常情况下,思政课的抬头率普遍低于专业课。思政课面临“理论性强、学生认同感低”的困境,盛君(2020)指出,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认为思政课对职业发展毫无作用,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思政理论性过强,教学方式比较单一,考试内容简单无新意且容易获得学分。

正因如此,课堂收获就是转变学生态度、吸引学生投入课堂的关键变量。蒋关军,陆丽青(2017)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编制《基础》课满意度调查问卷,通过对553名被试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相关分析后发现,“课程收获满意度”能显著预测“课堂抬头率”。当教学内容与学生的需求紧密结合时,学生能够将课堂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运用到生活或工作中,课堂参与度就会得到显著的提升。

同伴氛围也是影响课堂抬头率的重要环境因素,庞睿(2020)在与学生的座谈调查中发现,有90%的学生在思政课上玩过手机,这种群体性行为慢慢就会形成消极的课堂文化。当身边的同学普遍认为这门课无聊枯燥时,其他学生很容易产生负面的课程态度,进而导致课堂抬头率进一步降低。

(四) 技术媒介因素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已经成为影响现在大学生课堂抬头率的一项关键因素。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18年在校大学生手机使用调查》显示,大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的比例高达79%,平均每节课使用手机时长为13.9分钟,约占三分之一课时。许培瑾(2025)的课堂实验结果表明,在可以自由使用电子设备的课堂里,学生对社交媒体这类非课程内容的关注度明显更高,课堂抬头率也就明显更低。“互联网+”时代的各类媒体平台,还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本身的价值,学校在知识传播领域的垄断地位被彻底打破,在这种开放的教育环境里,如果老师没办法给出更贴合学生需求、更有

深度的知识, 学生就很难重视课堂内容, 课堂抬头率自然也会跟着下降。

技术媒介也同时丰富了教学方法, 合理使用相关教学手段, 能够提高课堂抬头率。曹焜(2020)在对某高校所有学院的问卷调查中, 有 48.21% 的大学生每天用手机看图像内容的时间达到 3 小时, 可以看出图像、视频内容在当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里占了很大一部分, 将图像、视频内容融入课堂中, 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增加课堂参与度。70.87% 的学生赞同, 老师上课的时候播放的视频、图片这类图像化教学内容, 有助于提高课堂抬头率。

盖逸馨, 张涛(2017)在探讨思政课程教学改革时指出, 应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 实现线上线下、课上课下的有效联动。这一思路不仅适用于思政课, 也可推广至所有课程。教师借助新媒体技术, 能够拓展与学生的交流空间与时间, 更精准地把控学生在课堂中的投入状态。同时, 新媒体技术还能提升课堂教学内容的吸引力, 引导学生将注意力从手机等电子设备转向课堂大屏幕, 从而增强课堂参与度, 提高课堂抬头率。

3. 核心共识、争议与未解问题

(一) 共识性结论

经过对现有研究的系统梳理, 现有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第一, 课堂抬头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并非单一主体的独立行为。学生内在认知动机、自我调控能力, 教师教学供给、课程环境、媒介环境则构成外部约束条件, 内外因素相互嵌套、共同决定了学生课堂专注行为的整体水平。第二, 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显著的层级性差异。学生主体因素属于底层基础性变量, 决定了学生注意力投入的潜在阈值; 教师教学设计与课堂组织属于核心调节变量, 能够直接干预、撬动学生课堂抬头率的即时变化; 而课程属性、智能媒介等属于环境约束变量, 对课堂专注度起到边界限定作用, 三者形成“基础-调节-约束”的层级作用结构。第三, 数字化时代下课堂注意力的形成机制发生结构性转变。传统课堂中教师权威、课程约束力是维持抬头率的主要保障, 而在移动媒介普及背景下, 学生注意力分配的自主性显著提升, 外部诱惑对课堂秩序的冲击由偶发变为常态, 如何解决高等教育教学模式与数字化时代学习习惯的适配性问题, 对学生、对老师、对学校来说都是一个挑战。第四, 课堂抬头率具有鲜明的情境化特征。同一学生在不同课程、不同教师、不同教学环节中的抬头率表现差异显著, 这也印证了单纯依靠学生自律无法解决低头问题, 必须从课堂生态整体优化的视角开展综合治理。

(二) 争议与未解问题

尽管现有研究在影响因素识别层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但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上仍未形成统一结论。

首先, 抬头率的操作化定义与测量标准尚未统一。不同研究对“抬头率”这一核心概念的界定存在明显差异: 杜新安(2011)将“抬头率”定义为学生在授课期间注视讲台、黑板或演示设备的时长占总听课时间的比例, 而付晓容(2018)则将其视为课堂上抬头持续听课的学生人数与到课总人数的比率。前者侧重衡量单个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后者则更关注整个课堂的集体专注水平。定义的分歧直接导致测量方法各异、研究结论难以比较与累积, 制约了该领域研究的可重复性与理论积累。

其次, 现有测量方法难以区分“形式抬头”与“有效抬头”。无论是基于人脸检测还是头部检测的技术路径, 大部分研究都是根据学生面部或头部状态判断学生是否抬头, 无法判断学生抬头时是否真正投入认知活动。这一局限使得现有研究的“抬头率”指标在反映真实学习投入方面存在效度风险。

然后, 不同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存在分歧。不同研究对学生因素与教师因素孰轻孰重给出了不一致的判断。例如, 顾晓英(2018)认为教师是影响课堂“抬头率”的最重要因素; 而蒋关军, 陆丽青(2017)的实证研究则发现“课程收获满意度”对抬头率的预测作用最为显著。这种分歧可能源于研究视角、课

程类型或样本特征的差异，但目前尚缺乏系统的比较研究来检验和澄清这一问题。

最后，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尚未厘清。多数研究采取“因素罗列”的策略，逐一报告显著影响抬头率的变量，但对这些因素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协同作用的相关研究不足。

4. 未来研究方向

针对当前研究存在的争议和问题，本文结合相关文献，从标准化测量、研究方法、理论建构三个方面，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一) 测量方法的标准化与技术升级

未来研究应首先明确统一的测量标准，明确区分“个人抬头率”与“整体抬头率”两个层面。唐康等人(2019)的研究已为此提供了可操作的技术路径，他们通过人脸检测系统区分个体与群体层面的抬头情况。后续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两种抬头率的适用场景与测量标准，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规范化与可比较性。

未来研究可将现有技术融合以提升测量精度。现有测量技术形成了两条主要路径：一是基于人脸检测的方法(唐康等, 2019)，抬头语义对应性强但对环境敏感；二是基于头部检测的方法(倪童, 桑庆兵, 2022)，环境适应性较好但计算复杂度较高。未来研究可尝试融合两类技术的优势，构建多特征融合的测量模型。同时，可探索将眼动追踪、头部姿态估计、面部表情识别等多种技术手段相结合，构建多维度的课堂专注度测量体系。

与此同时，未来研究还需准确区分“形式抬头”与“有效抬头”。可以结合面部表情识别判断学生是否呈现与认知投入相关的表情状态；引入眼动追踪技术判断学生视线是否稳定注视教学区域；或通过即时学习效果测验评估抬头时刻的认知加工深度，从而提升抬头率指标的教学诊断价值。

(二) 研究方法的丰富与拓展

现有研究大多面对全校，各校进行调查研究，以后的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对同一班级、同一课程进行多时间点的持续观测，探究抬头率的变化轨迹及其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之间的动态关联。

开展跨课程类型的比较研究。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思政课，对其他课程类型的关注不足。课程性质、考核方式、班级规模等课程特征变量，很可能调节着各影响因素对抬头率的作用强度。未来研究可开展跨课程类型的比较研究，检验现有结论的外部效度，并探索不同课程类型的差异化提升路径。

(三) 理论建构的深化与整合

未来研究应在现有因素识别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基础-调节-约束”的多层次整合模型，明确学生因素、教师因素、课程因素、环境因素之间的层级关系与作用机制，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多层线性模型等方法对因素间的直接、间接及调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在因素影响机制方面，大多数研究停留于考察各因素对抬头率的独立影响，未来研究应在单一因素的“主效应”分析基础上，转向多因素的“交互效应”与“条件效应”研究。例如，不同课程类型是否该采取不同教学方法，教师的课堂管理策略是否调节了学生自控能力对抬头率的影响，这些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关注。

不仅如此，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学生的信息获取习惯与注意力分配模式，这一变化也深刻影响着课堂抬头率。学生低头行为不应简单归因于个体层面的“意志薄弱”，而应视为认知习惯与环境变迁之间的“结构错配”。未来研究可从教育社会学、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出发，探讨数字化时代学生注意力特征与高校课堂教学模式之间的适配性问题，为理解和提升课堂抬头率提供新的分析框架。

5. 结语

课堂抬头率与教学质量息息相关，它能反映学生的注意力分布、学习动机状态、教师的教学效果，

能够回答怎样的课堂是有价值的。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 研究者们已经归纳出影响抬头率的多方面因素, 并在学生主体、教师教学、课程环境、技术媒介等层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当然, 该领域仍面临一系列亟待突破的挑战: 抬头率的操作化定义与测量标准尚未统一, 研究方法以横截面调查为主、纵向与质性研究不足, 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机制尚不清晰, 且现有测量技术难以区分“形式抬头”与“有效抬头”。未来研究应从测量方法的标准化与技术升级、研究方法的丰富与拓展、理论建构的深化与整合三个方向协同推进。唯有如此, 才能更准确地归纳课堂抬头率的影响因素, 为提升高校课堂教学质量提供坚实的研究基础。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2410332076Z); 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改项目(20253028)。

参考文献

- 曹婣喧(2020). “新高教 40 条”背景下大学生课堂“抬头率”与图像传播的关联研究. *智库时代*, (14), 64-65.
- 杜新安(2011). 关于思想政治课“到课率、抬头率和点头率”的探索. *教育与职业*, (36), 143-144.
- 付晓容(2018). 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抬头率提升探究.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4), 96-99.
- 盖逸馨, 张涛(2017).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要提高课堂“三率”. *思想教育研究*, (12), 88-91.
- 顾晓英(2018). 提升思政课课堂学生“抬头率”的思考与实践. *中国高等教育*, (2), 39-41.
- 蒋关军, 陆丽青(2017). 高校思政理论课满意度调查问卷的编制及检验——以《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为例. *教育学术月刊*, (8), 64-69.
- 倪童, 桑庆兵(2022). 基于注意力机制与特征融合的课堂抬头率检测算法. *计算机工程*, 48(4), 262-268.
- 庞睿(2020). 从知识供给到信仰重构——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抬头率的批判性审思及其提升路径.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0(4), 120-126.
- 盛君(2020). 高校课堂“抬头率”不高的问题归因及提升策略. *品位经典*, (8), 81-82.
- 唐康, 先强, 李明勇(2019). 基于人脸检测的大学课堂关注度研究.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36(5), 123-129.
- 王宝森, 宫泽怡, 程曦雅, 马婷(2025). 大学上课抬头率与教学效果的调查研究. *现代教育论坛*, 8(11), 219-221.
- 许培瑾(2025).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课堂抬头率提升策略分析——以西安明德理工学院为例. *陕西教育(高教)*, (7), 44-46.